



历史上的今天

(五十六)

张俊杰 主编

目录

8月8日	1
国内	1
前 685 鲁国被迫交出管仲	1
1961 年梅兰芳病逝	8
1980 年国民党空军少校黄植诚从台湾驾机回国	11
国际	16
1525 德意志农民起义开始	16
1673 年荷兰从英国手中夺回纽约和新泽西	21
1918 年协约国发动亚眠战役	29
1945 年苏联宣布对日作战	30
1967 年新加坡等国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	31
1980 年导致孟加拉国建立的叶海亚·汗病逝	33
8月9日	46
国内	46
1896 年宣传民权思想的《时务报》发行	46
1937 年日本大规模进攻上海	58
1945 年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58
1958 年毛泽东提出“还是人民公社好”	59
国际	74
1173 年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破土动工	74
1942 年英国逮捕印度圣雄甘地	75
1962 年德国作家海塞去世	77
1965 年新加坡独立	91
8月10日	96
国内	96
前 619 年周襄公逝世	96
1126 年蔡京被逐	100

1900 年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出生在广西博白县..	100
国际.....	122
1519 年麦哲伦船队出发.....	122
1790 年第一艘环球航行的美国轮船驶进波士顿港。.....	124
1913 年巴尔干战争结束.....	124
1945 年戈达德逝世.....	125
8 月 11 日	129
国内.....	129
1872 年清政府派遣容闳等率领的留学生出洋..	129
1880 年清政府调左宗棠来京.....	132
1984 年李维汉逝世.....	136
国际.....	138
1858 年发现维生素的克里斯蒂安·艾伊克曼诞生	138
1919 年德国《魏玛宪法》正式生效.....	140
1954 年法国和越盟正式实现和平.....	141
1964 年智利同卡斯特罗政权断交.....	144

8月8日

国内

前 685 鲁国被迫交出管仲

管仲，(? ~ 前 645)春秋时齐国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亦称管敬仲。据说他早年经营商业，后从事政治活动。在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纠。小白取得君位后，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管仲亦辅佐齐桓公，施行改革。在政治上，他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征”（见先秦租税），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

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得到稳定和改善的基础上，管仲积极促使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权。所谓“攘夷”，是对侵占华夏地区的戎、狄进行抵御。前 649 年，扬拒泉皋之戎入侵王室地区。此后二年，以齐为首的诸侯国派兵戍守王都。前 644 年，山戎伐燕，齐军救燕。前 661 年狄人攻邢（今河北邢台境内），次年灭卫（今河南淇县）。其后二年，以齐为首的诸侯国恢复卫国，另建卫都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所谓“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前 655 年，齐军与诸侯军伐楚，迫

使楚国向王室贡送蚕丝(一说为包茅)。在葵丘之会的盟辞中,有诛不孝、无得更易太子、不允许以妾为嫡妻、不得私自分封国邑等条文,目的皆在于维护周天子下的宗法制度。所谓争取与国,是运用军事、经济手段来取得中小诸侯国的支持。谭(今山东济南东)遂(今山东肥城西南)等国曾藐视齐国,被齐灭掉。服从者来朝聘,齐取厚报。前651年,由齐国召集葵丘之会,确定诸侯国间不得筑堤防雍水来危害邻国,不得有意不卖给邻国粮食。

管仲的对内、对外政策,将守旧与革新结合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两重性、过渡性。但他毕竟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霸业。

管仲经济改革的内容。

对于管仲的经济变革,文献中记载较多的仅有《国语·齐语》和《管子》。《管子》成书情况较为复杂,叶适《水心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这是很中肯的话。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有《王兵》一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文物》1976年第12期。),其文字错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兵法》诸篇,相比之下,《王兵》是一篇完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则有许多地方显出经过割裂拼凑的痕迹。该墓竹简的书写年代,有人考证至少在汉文帝即位(公元前179年)之前(许荻:《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文物》1974年第2期。),因而,《王兵》与同墓出土之《田法》、《库法》、《市法》等十三篇,当是战国时齐人作品,而《管子》则可能与这类文章有关。由此,亦可见《管子》

成书之复杂。笔者认为《管子》成书于战国，尽管包含不少春秋时代的史实，但其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战国社会实际，不能用作研究管仲改革的主要依据。《国语·齐语》的记载学者多以为比较可靠，本文试图仅仅依据《齐语》来分析管仲经济变革的具体内容。

管仲的经济变革，据《齐语》，其主要内容为“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相地而衰征，……山泽各致其时，……陆阜陵墘，井田畴均”。它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社会基层劳动者靠行政手段予以严密编制。

管仲依国、鄙分别予以编制：

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国语·齐语》。）

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国语·齐语》。）

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对鄙民的编制是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其次，对国人的编制是随国人地位下降而实行的一种改革措施。

西周时期，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多以“族”（包括“族”、“宗”、“人”、“夷”、“姓”等）为单位整体施以剥削，对其内部活动一般不加干预，甚至对其内部人数也是不甚了了。到周宣王时，由于王师败绩于

姜戎,需要扩大财源和兵源,才有所谓“料民”之举(《国语·周语上》)。随着劳动者对土地附着程度的提高,被统治者又多以“邑”(包括“里”、“采”等)为单位被整体剥削。“邑”被相对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之上,统治者对其内部情况有了较多了解,也开始实际干预其内部活动,但这种邑毕竟是自然产生的,并非统治者强力编制而成,故其中户数不定,它与管仲变革时编制三十家而成的“邑”名同而实质迥异。随着自然形成的“族”、“邑”的逐渐瓦解,随着旧有的对“族”、“邑”的剥削难以为继,针对此现实,才有了管仲对鄙民的强制编制,这是一种全新的统治措施。如果说西周时期的“族”、“邑”之类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那么管仲以行政手段将三十家编制成的“邑”只能是一种基层行政组织,其经济职能只是其行政职能的延伸,本身并不具有自我调控机制,因而不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范畴之内。

关于国人,西周时他们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人,享有一定特权,这一点前人已多有论叙,此不赘述。到春秋时期,国人地位逐渐下降,在齐国以至于被强制编制,再用他们作军队主力。齐国国人地位的这种变化,与其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有密切关系。如果依据李亚农先生的分析,周灭殷时周族总人口大概不过六七万,分到一国,像鲁这样的重要国家,顶多不过二三千人。由此可见,周初各诸侯国国人数量并不多,即使考虑到齐国非姬姓,其国人数量大大多于姬姓封国,将这个数目再扩大几倍,其总数也不过万人上下。而到管仲变革时,制国为二十一乡,一乡二千家,以战国时一家五口计之,则共有国人二十一万人,何况当时一家并不止五人,有“十口之

家”、“百口之家”，其总数必定超过二十一万，这比开国之初至少增加了数十倍。国人中除少数事工商者可以自给外，士之十五乡皆“使就闲燕”，不事生产，他们像古罗马的无产者一样要靠社会来养活。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的生活需求逐渐超出了社会经济承载力，其经济状况必然下降，而国家又必须使用他们来打仗，必须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因此必须有严密的强制编制，“勿使杂处”，以使其“安心”、“不见异物而迁”，并“令勿使迁徙”（《国语·齐语》。），这种需要导致了管仲的变革。自此而后，各国国人地位逐渐下降，到战国时，国人与鄙民之间的地位差别渐濒于泯灭。

2. 对被剥削者实行国家授田制度。

《齐语》记管仲治鄙政策之一为：

陆阜陵瑾，井田畴均。（《国语·齐语》。）

对这条政策，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字面上看。“陆阜陵瑾”，韦昭注曰：“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瑾，沟上之道也。”《尔雅·释地》邢昺疏引李巡曰：“高平谓土地丰正，名为陆；土地高大名为阜；最大名为陵”。此处陆、阜、陵显然指三种土地类型，陆既然指土地丰正者，可见为良田，阜、陵虽较差，当也是可耕地。瑾为道路，与陆、阜、陵非同类词，此处当作动词讲，即布道路于陆、阜、陵之上。这种广泛布置的道路，显然与田界有关，即为一种界道合一的新设施。商鞅变法时所设阡陌系统即系界道合一，“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顷，一阡道，道广三步。”（秦《为田律》，见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

第1期。)本文第四章将对此进行讨论,阡道、陌道既为田界,又是道路,商鞅设置的这种界道合一体,是为实行授田制服务的。而管仲的广布道路,显然也与授田制的推行有密切关系。“井田畴均”,韦昭注曰:“九夫为井,井间有沟。谷地曰田,麻地曰畴。均,平也。”此注不甚允当。“田”,《说文》曰“树谷曰田”,《释名·释地》曰“已耕者曰田”,《玉篇》曰“地也”,《广雅·释地》曰“土也”。“畴”,《说文》曰“耕治之田也”,《一切经音义》曰“耕地也”,《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曰“美田曰畴”。此处田畴实为同义语,均为耕地或土地之意。“井”字,一般以《孟子》或《周礼》来套解,释为九小块组成一大块的土地。对此种看法,笔者以为是不正确的。(关于《孟子》、《周礼》“井田”言论之剖析,“井田”一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真正含义,本文第五章将有详细讨论,请参照。)以井述田,实际上仅取其一定方块的田土形似井状之意,并不包含九小块的内容在内。“井田畴均”之井当作动词讲,即平均划分田畴如井状的小方块。先秦文献中许多包含“井”字而涉及土地制度的史料以此来解都显得更为妥当,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周礼·小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野”,《管子·侈靡》“断方井田之数”,均为动宾结构。综括上述,管仲这条政策从字面上看,即在各类田地里广布道路,平均地划分为一定的小方块,从而使民“不憾”,这显然是对被剥削者“民”实行授田制度。

其次,从历史背景上看。关于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本文第二章已经作了讨论,它由两个层次组成。社会主要的剥削形式是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剥削关系

终止于“族”、“邑”之类集团，其间作为剥削关系实现中介的土地仅只是“田”，这些土地用以实现“族”、“邑”集团的剩余劳动，剥削者仅只关心这一部分土地。至于被剥削者实现必要劳动的田土，则由“族”、“邑”内部自行调节与组织，剥削者并不干预。管仲经济变革则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被剥削者鄙民所使用的土地，并谈到要使田“均”，从而使民“不憾”，显然，国家对一般被剥削者的控制已经达到其个人人身，不再经过具有自调节功能的前资本主义公社这一中间环节，公社调节其内部成员使用土地方式的职能被国家接收了过来，这明显是在实行国家授田制度。

再次，从同时实行的其他变革来看。根据《齐语》，与此有关的变革还有两项，一为“相地而衰征”，一为“山泽各致其时”、“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前一项基本内容是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并根据土地肥瘠决定剥削量，这里，剥削的依据已经开始显示出从人身向土地过渡的痕迹，即将一定量的土地与一定的劳动者人身联系、等同起来，这种剥削显然要以国家授田作为基本前提。关于后一项，既然称为“立”，可见三虞、三衡以前还没有，为管仲变革时所新设立。这里的山泽实际上包括了耕地以外的所有土地，对这些土地，以前剥削者并不加以管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即“田”。由于主要的耕作方式是间隔时间不等的撂荒制，大量荒地为农耕所必需，故这些荒地实际上为各被剥削村社实际使用并占有。管仲变革时特意设机构及官吏严加管理，定时开放，比较合理的解释，还是为了将被剥削者较牢固地束缚于国家所授予的耕地上。

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说，管仲的“陆阜陵墿，井田畴均”，实即国家对被剥削者实行授田制度。

3. 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

《齐语》记管仲治鄙的另一政策为：

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

韦昭注曰：“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很明显，这是实行以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这条政策在《管子·乘马数》中又称之为“相壤定籍”，其含义是清晰的。

西周时期，剥削者通过对“族”“邑”这样一些自调节系统的掌握，对被剥削者人身集团地予以牢固控制，在这种条件下，剥削主要采取了劳役剥削的形式，《诗·豳风·七月》对此有十分细致的描述，这时具有特殊意义的“田”的存在，也说明了剥削形式主要是劳役剥削。管仲实行的以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显然与以前不同，也是一种变革。

由上述三条看，管仲对齐国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根本性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使齐国迅速强大，“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而且也贯穿于春秋战国的一系列改革运动肇始先声。

1961年梅兰芳病逝

梅兰芳，名澜，又名鹤鸣，字畹华、浣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兰芳。江苏泰州人，1894年生于北京，他出生于京剧世家，8岁就开始学戏，10岁登台在北京广和楼演出《天仙配》，工花旦，1908年搭喜连成班，1911年北京各界举行京剧演员评选活动，张贴菊榜，梅

兰芳名列第三名探花。1913年他首次到上海演出，在四马路大新路口丹桂第一台演出了《彩楼配》、《玉堂春》、《穆柯寨》等戏，初来上海就风靡了整个江南，当时里巷间有句俗话：“讨老婆要像梅兰芳，生儿子要像周信芳”。他吸收了上海文明戏、新式舞台、灯光、化妆、服装设计等改良成分，返京后创演时装新戏《孽海波澜》，第二年再次来沪，演了《五花洞》、《真假潘金莲》、《贵妃醉酒》等拿手好戏，一连唱了34天。

回京后，梅兰芳继续排演新戏《嫦娥奔月》、《春香闹学》、《黛玉葬花》等。1916年第三次来沪，连唱45天，1918年后，移居上海，这是他戏剧艺术炉火纯青的顶峰时代，多次在天蟾舞台演出。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创造了醇厚流丽的唱腔，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派。1915年，梅兰芳大量排演新剧目，在京剧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上均进行了独树一帜的艺术创新，被称为梅派大师。

1919年4月，梅兰芳应日本东京帝国剧场之邀赴日本演出，演出了《天女散花》、《玉簪记》等戏。一个月后回国。1921年编演新戏《霸王别姬》。1922年主持承华社。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中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梅兰芳因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与程砚秋、尚小云等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

1930年春，梅兰芳率团赴美，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市献演京剧，获得巨大的成功，报纸评论称，中国戏不是写实的真，而是艺术的真，是一种有规矩的表演法，比生活的真更深切。在此期间，他被美国波莫纳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迁居上海，先

暂住沧洲饭店，后迁马斯南路 121 号。他排演《抗金兵》、《生死恨》等剧，宣扬爱国主义。1935 年他曾率团赴苏联及欧洲演出并考察国外戏剧。在京剧艺术家中，出访最多和在国内接待外国艺术家最多的当属梅兰芳，他把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和艺术家谦逊、朴实的优良品质介绍给了各国人民，因此人们称他为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国京剧艺术的文化使节。

抗战爆发后，日伪想借梅兰芳收买人心、点缀太平，几次要他出场均遭拒绝。梅兰芳考虑到在上海不能久留，遂于 1938 年赴香港。他在香港演出《梁红玉》等剧，激励人们的抗战斗志。1941 年香港沦陷后，他安排两个孩子到大后方读书，自己于 1942 年返沪。为了拒绝为日伪演剧，他蓄须明志，深居简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上海复出，常演昆曲，1948 年拍摄了彩色片《生死恨》，是中国拍摄成的第一部彩色戏曲片。上海解放后，于 1949 年 6 月应邀至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1950 年回北京定居，任文化部京剧研究院院长，1951 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1952 年任中国京剧院院长，并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5 年，他拍摄了《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收入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宇宙锋》、《断桥》等及他生活片断和在工厂、舞台演出的《春香闹学》等戏的片断。1956 年他率中国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演出。1959 年 5 月他在北京演出《穆桂英挂帅》，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节目。1961 年 8 月 8 日在北京去世。著有《梅兰芳文集》、《梅兰芳演出剧本选》、《舞台生活四十年》等。代表剧目有《贵妃醉酒》、《天女散花》、《宇宙锋》、《打渔杀家》等，先后培养、教授学生 100 多人。

1980年国民党空军少校黄植诚从台湾驾机回国

11年前，35岁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林贤顺中校驾驶着F - E 5式战斗机，在12架台湾空军飞机的狂追下，飞回了祖国怀抱。他是继黄植诚之后的又一位、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位从台湾驾机起义飞回大陆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他的回归没有像当年黄植诚那样轰动，他很快便“销声匿迹”了。一个偶然的机，笔者获知他与笔者生活在同一城市，采访了他，了解了当年驾机起义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石家庄市的一个三口之家的住宅里，一派儒将风度的林贤顺大校近日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除了我的履历，我并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现在最幸福的感觉是：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老兵，是一个小家庭中幸福的丈夫和父亲。”林贤顺平和地说。

林贤顺1953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台湾东部的一个飞行基地工作，飞了一年后，他被调到台湾桃源空军飞行基地工作。

1981年，刚刚从桃源机场调离不久的林贤顺，忽然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黄植诚驾机从桃园机场“叛逃”回大陆了。这个消息让林贤顺很是吃了一惊：在台湾桃源机场工作的四年，他曾和黄植诚同在一个飞行大队工作，当时，黄植诚任5大队17中队的督察考核官，林贤顺任26中队的上尉情报官，两人经常见面，

彼此间很熟悉。黄植诚的起义，就像一个亮点，把林贤顺的目光也吸引了过去。

林贤顺说：“我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我对大陆却一直有很深的感情。我的祖先是广东梅县客家人，因此，对大陆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在我的心底，一直深埋着一个梦，那就是，有朝一日，我想亲眼回大陆看一看……”

1989年，林贤顺被提拔为台东空军基地的一个飞行中队的辅导员。辅导员在中队的任务主要是强化官兵忠于国民党的思想，时时对官兵进行反共宣传。干着自己不想干的事，说着自己不想说的话，再加上与妻子感情不和，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他想“远走高飞”。

1989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六，空军中校林贤顺终于下定决心，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性命攸关的一个决定：他要驾机离开台湾，离开这座孤岛和孤岛上令他厌倦的日子，飞向大陆，飞向新生活 and 希望。

1989年春节刚过，林贤顺就开始寻找机会。2月11日，天气预报台湾是阴天，大陆那边是晴天，有利于寻找机场降落，正好是理想的天气。下定决心的林贤顺在早上一上班后即走向机场，进行例行的巡查。此时此刻虽然他脸上的表情依旧泰然自若，但心情却无法平静。

他走近跑道上的一架已经加好油的F - E 5飞机，了解到这架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训练，飞行员一会儿就到。于是他对值班的地勤人员说：“今天我飞这架飞机，赶快收拾，不要误点儿。”

两分钟后，飞机轰鸣着起飞了。五分钟后，林贤顺

已经进入了台湾海峡。一进入海岸线，为避免雷达发现，林贤顺就贴着海面飞行。

五分钟后，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到机场后找不到飞机，感到莫名其妙，赶紧报告了指挥部。指挥部一查才知道出了意外，一阵慌乱之后，12架正在待命的飞机立即携弹起飞追击。但一切似乎已经晚了，这宝贵的五分钟，为林贤顺赢得了有利的时机，也使他逃脱了死神的追捕。

从飞机起飞开始，林贤顺就关闭了飞机上的无线装置，因此，外面发生的情况他一概不知。

台湾机场方面在命令飞机起飞追击林贤顺的同时，还用雷达搜索他，导弹装置都已打开，一旦发现目标，即用导弹击落他的飞机。但因为林贤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在进入海岸线后一直超低飞行，雷达很难发现。所以台湾机场指挥部很焦急，在呼叫林贤顺没有回应，雷达搜索又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一急之下，由原来用“暗语”和追击林贤顺的12架飞机联系竟然直接改用“明语”联系：“命令你们，如果目标飞越海峡中线，发现后立即击落！”

这一信息被对岸我方空军机场监听到后，我方猜测可能有特殊情况，立即作出了反应。四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向雷达上发现的由台湾方向飞来的12架飞机迎面飞去。

20分钟后，林贤顺驾驶的F-5E飞机已经飞过了海峡中线。他的心里一阵激动。作为一名飞行员，他知道，飞越了海峡中线，就意味着胜利在望。两岸的飞行员在训练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海峡中线实际上就是两岸的分界线，没有非常情况，谁也不敢轻易“越位”。他不知道，后面的12架战斗机正以两倍的

音速追击他，距离他仅有20多海里。

12架追击的台湾飞机也不顾一切地飞越了海峡中线，以两倍音速追击林贤顺。我方的飞机也即将迎面赶到，战斗一触即发。这一切，林贤顺全然不知。

也许感觉到已经鞭长莫及，为避免将事态扩大，在12架奉命追击林贤顺的飞机冒险飞越了海峡中线后，台方指挥部及时下达了收兵的命令，12架追击的飞机只好悻悻而返。

看到台湾方面的飞机已经返航，我方的四架飞机开始返回来寻找林贤顺的飞机。但由于当天大陆这方面雾很大，一直没有发现已“越境”的林贤顺。短暂的工夫，林贤顺竟然“失踪”了……

其实，林贤顺并没有“失踪”，因为地形不熟，加上雾大，林贤顺没有发现我方起飞引导的四架飞机。最初，他也在寻找我方的飞机，他想，一旦大陆的雷达发现他飞过来，必然会有飞机起飞引导他降落，但可惜一直没有发现。

因为两岸飞机的无线装置配置不一样，所以飞过来后，虽然林贤顺已经把无线装置打开，但我方还是无法与他联系。无奈，飞到汕头上空的林贤顺只好驾机盘旋着搜寻机场。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飞机里的油所剩不多。一旦找不到机场，他将只能坠机跳伞。于是他只好离开汕头，向丰顺方向飞去，但在丰顺他同样没找到机场。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他开始向着城外人烟稀少的地方飞去。当飞到丰顺城外的一片开阔地时，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因为燃料耗尽熄火，另一个发动机也出了故障损坏，10时左右，林贤顺只好弃机跳伞。

“我最后降落到大片的水田里，飞机坠毁在一个小